



西汉长安人口地理探析 ——以元始二年长安人口为例

黄永美¹ 徐卫民²

(1.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9; 2. 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, 陕西 西安 710069)

摘要: 目的 根据人口构成推算西汉元始二年(公元2年)长安人口数量,为古代都城乃至现代城市人口研究提供参考。方法 历史文献、考古资料与逻辑推理相结合。结果 西汉长安城有限的闾里设置和严格的户籍制度,表明《汉书》所载人口不只是编户齐民,基本包含了所有在籍人口,因此,从长安人口构成推算,在籍人口24至27万,加上无籍人口至多不过30万。结论 西汉元始二年长安在籍人口24至27万,表明《汉书》所记载基本上是可靠的,因此,对学界40万或50万的人口数量观点持否定态度。

关键词: 西汉; 长安城; 人口; 户籍制度; 人口构成

中图分类号: K234.1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0-274X(2012)03-0471-06

The study on Chang'an City's population geography of the Han Dynasty: Taking the population in A. D. 2 for example

HUANG Yong-mei¹, XU Wei-min²

(1. College of History, Northwest University, Xi'an 710069, China;

2. College of Cultural Heritage, Northwest University, Xi'an 710069, China)

Abstract: **Aim** Studying Chang'an City's population in A. D. 2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composition is to offer reference for the studies on capital or urban population. **Methods** Historical geography,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and logical reasoning. **Results** Because the zone setting of Lili in Chang'an City was limited, and the census register system was strict in the Han Dynasty, the record in *Han Shu* not only contained the household register population, it had contained all the people who registered. The number of Chang'an City's population in A. D. 2 is between 240 thousand to 270 thousand by a base conjecture upon every population composition in Chang'an City. It is not more than 300 thousand, if the people that were not in the register were included. **Conclusion** Between 240 thousand to 270 thousand, Chang'an City's population in A. D. 2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cord about the population in *Han Shu* is basically reliable, so there is a negative attitude to the guess of 400 thousand or 500 thousand of Chang'an city's population.

Key words: the Han Dynasty; Chang'an City population; the census register system; population composition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元始二年(公元2年)长安“户八万八千,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”^[1]。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偏低,若按户均5口算,应在40万左右,加上皇族、士兵、僮仆、吏民役夫、商贩、求学的儒生

等远不止40万^[2],可能50万或更多^[3-4]。也有根据漕粮推有46万^[5],但漕粮并非仅供给长安城的吏民消费,且非一次性消费。因此,西汉长安人口数量至今仍未有定论。笔者在前人研究^[2-9]的基础上,

收稿日期: 2011-03-11

基金项目: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研究基金资助项目(06JJD770019)

作者简介: 黄永美,女,河南安阳人,西北大学博士生,从事秦汉历史地理研究。

从长安范围和设置着手,依据户籍制度和人口构成,对元始二年(公元 2 年)长安人口数量作了初步探索,以求教于方家。

1 长安的范围及设置

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京兆尹有县 12: 长安、新丰、船司空、蓝田、华阴、郑、湖、下邳、南陵、奉明、霸陵、杜陵。可见长安只是京兆尹下属县之一,而其范围则只指长安城,因为史料明确记载长安高帝五年(公元前 202 年)置,惠帝元年(公元前 194 年)初城,六年成。又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“莽以《周官》、《王制》之文,置卒正、连率、大尹,职如太守;属令、属长,职如都尉……分长安城旁六乡,置帅各一人。”运用“城旁”二字,说明“置帅”的六乡不属于长安范围,否则不必用“城旁”二字,用此二字也说明不在长安城内不能称长安六乡。因此,长安县的范围为“惠帝元年(公元前 194 年)初城,六年成”的长安城,出了城便不属于长安县。所以《汉书》中长安户口资料也只限于长安城内户口。即便是长安界定与此不同的学者也认为《汉书》所载长安人口指城内人口^[2]。

1.1 长安城内行政机构设置

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诏书:“惟设此壹切之法以来,常安六乡巨邑之都,桴鼓稀鸣,盗贼衰少,百姓安土,岁以有年,此乃立权之力也。”作为一份安慰民心的诏书,其所说地理范围应精确无误,因此,“常安六乡”即“长安城内六乡”而非“城旁”,可见长安城内设 6 个乡。又“长安闾里一百六十,室居栉比,门巷修直”^[10]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载平常“起五里于长安城中,宅二百区,以居贫民”。现考证“建章乡、卢乡、东乡,均为西汉长安乡名。已知汉代长安里名有尚冠里、修成里、大昌里、戚里、宣明里、建阳里、昌阴里、黄棘里、北焕里、南平里、陵里、函里、李里、孝里、宜里、棘里、南里、苟里、有利里、当利里、假阳里、器陵里、敬上里,共计 23 个。”^[7]

1.2 里的规模和小

“《周礼·地官·遂人》载 25 家,《汉书·张安世传》载 30 家,《管子·小匡》载 50 家,《尚书大传》载 72 家,《公羊传》载 80 家,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载 200 家……从湖北省江陵凤凰山 10 号汉墓出土资料看,一里 25 户以上,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资料显示,户数最多的 108 户,其次是 81 户,68 户,12 户……关中和黄河中下游地区,传统的里的户数应多保持在 50 家以上、接近百家”^[8],但平帝安抚流民

宅“五里二百区”,作为安抚设置其容纳量必是最大限度,而且“汉代特别重视首都的样板作用,讲究各方面都要作好,才能‘示四远’。在首都安排 1 里平均住 40 家,恐怕这是一个常数”^[9],因此,长安城内 1 里 40 户是上限。但是,长安城是都城所在,“‘大第’和‘甲第’的行政单位也是‘里’,像居住皇亲国戚的戚里、达官显贵生活的尚冠里,都应分布在‘大第’和‘甲第’之中,并不与普通城市居民居于同里”^[11],故并非每里居户都相同。若均以上限 40 户计,160 里也只容纳 6 400 户,与记载“户八万八千”相差甚远。

同时,考古发掘汉长安城城内总面积约 36 km²,居民区仅占约 7 km²^[12]。根据 2003 年河南内黄发现的汉代村落遗址,第一处院落基础南北约 20 m、东西宽约 18 m;第二处院落钻探面积约 4 200 m²,古代遗存面积约 1 700 m²^[13]。辽阳三道壕 6 处西汉村落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东西宽约 20 m,南北长约 13 m;最大的东西宽约 22 m,南北全长约 30 m^[14]。长安城繁华程度远远胜于遗址地,人口稠密则是必然,又因“汉代城市民户住宅的平均占有面积在 70 ~ 80 m²”^[8];作为都城应高于城市平均数,因此“每户面积为 324 m²,这作为户均占地面积应是可以理解的”^[15];同时参考发现的村落遗址,将达官贵族与闾里平民的宅基地均按东西 20 m、南北 13 m 计,则容下约 26 923 户,与记载“户八万八千”仍有差距。

因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:“民饥饿相食,死者数十万,长安为墟,城中无人行。”数十万与“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”相比,确实能达到城中无人的效果,故应不是记载有误;且西汉户籍制度保证了《汉书》编纂人口时有籍可查。

2 西汉户籍制度

2.1 户籍的内容

秦从商鞅变法到统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户籍系统,汉承秦制,实施编户齐民。《汉书·杨胡朱梅云传》载:“孔氏子孙,不免编户。”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:“夫盐,食肴之将;酒,百药之长,嘉会之好;铁,(曰)[田]农之本;名山大泽,饶衍之藏;五均赊贷,百姓所取平,印以给澹;铁布铜冶,通行有无,备民用也。此六者,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……”《汉书·高帝纪》中颜师古注:“编户者,言列次名籍也。”

今考古发现汉简中多名籍称谓,如居延汉简“万岁部建平五年五月吏卒粟名籍”、“元康九月吏

卒名籍”、“甲渠候官建始二年正月部卒名籍”^[16-18]。虽然关于名籍是否等于户籍尚有争议,但学者们都不否认名籍透露了户籍内容^[17,19]。经研究,汉代编户齐民登记的内容是户主及家庭成员的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职业、籍贯、爵位与官位、财产等内容^[16-20]。因此,未到傅籍年龄的婴儿或小孩和到免年龄的老人,都同样要载入户籍。

除编户齐民外,还有特殊户籍。《户律》规定:“自五大夫以下,比地为伍”^[21]。五大夫以上第十九级关内侯,第十八级大庶长,第十七级驷车庶长,第十六级大上造,第十五级少上造,第十四级右更,第十三级中更,第十二级左更,第十一级右庶长,第十级左庶长,均不入编户齐民。《汉书·文帝纪》载文帝“复诸刘有属籍”;《汉书·宣帝纪》载宣帝曾被“诏掖庭养视,上属籍宗正”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载平帝“赐九卿已下至六百石、宗室有属籍者爵”,说明“宗室籍”和六百石以上的“官籍”不入编户齐民。

此外,还有“通侯籍”、“侯籍”和“博士弟子籍”。如《汉书·高帝纪》高祖“至雒阳,举通侯籍召之”。《汉书·高惠高后文功臣表》载“高后二年(公元前186年),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,录弟下竟,臧诸宗庙,副在有司……孝宣皇帝愍而录之,乃开庙臧,览旧籍……”。《汉书·儒林传》载“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,补博士弟子……其高弟可以为郎中,太常籍奏”。又《史记·外戚世家》载吕太后出宫人赐诸王,各五人,窦姬在行中。窦姬欲如赵近家,请其主遣宦者吏:“必置我籍赵之伍中”。可见后妃、宫女亦有籍。

《汉书·武帝纪》注引张晏曰:“吏有罪一,亡(人) [命]二,赘婿三,贾人四,故有市籍五,父母有市籍六,大父母有市籍七,凡七科也。”所以这些“秦汉时期贫贱民等级包括家资产不达为吏标准的贫户、赘婿、罪犯、从事商、工、医、巫、卜等贱业者及其后代,其中主要是被贬抑谪罚的七科谪户”^[22]也有特殊户籍。

2.2 户籍的管理

西汉户籍的管理非常严格,《户律》载:“民宅园户籍、年细籍、田比地籍、田命籍、田租籍,谨副上县廷,皆以篋若匣匮盛,缄闭,以令若丞、官啬夫印封,独别为府,封府户;节(即)有当治为者,令史、吏主者完封奏(奏)令若丞相,啬夫发,即杂治为;臧(藏)□已,辄复缄闭封藏(藏),不从律者罚金各四两。其或为诈伪,有增减也,而弗能得,赎耐。官恒先计讎,□籍□不相(?)复者,系劾论之。民欲先令相分田宅、奴婢、财物,乡部啬夫身听其令,皆参辨券书

之,辄上如户籍。有争者,以券书从事;毋券书,勿听。所分田宅,不为户,得有之,至八月书户,留难先令,弗为券书,罚金一两”^[21]。对户籍的保管、人口登记均严格要求,不及时登记的要罚金。

同时每年定时登记、核对,“至八月书户”即“八月案比”。如《后汉书·安帝纪》中引《东观汉记》:“方今八月案比之时,谓案验户口,次比之也。”《后汉书·江革传》载江革“与母归乡里。每至岁时,县当案比。革以母老,不欲摇动,自在辕中挽车,不用牛马。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”。其中“每至岁时,县当案比”注曰:“案验以比之,犹今儿阅也。”连老母也一定要出场供人案比,可见执行的严格。东汉尚能如此,更不用说西汉,因为“对于豪强势力尚未得到高度发展的西汉来说,为了保证朝廷的赋税收入,对户口的管理比较严格,在社会安定的情况下,基本上可以使纳税人全部编入户籍”^[23],对老人、小孩进行考核,保证了户数的准确性。

此外为方便管理,要迁移的编户民应提前向啬夫提出申请,经审核批准、开具证明后方可迁移至新的乡里进行入籍居住。若在规定时间内未予受理或推迟办理,啬夫要承担法律责任;未经批准而迁移的属于任意流移或逃亡。汉律禁止任意迁移,如《汉书·淮南厉王传》载凡“亡之诸侯、游宦事人及舍匿者,论皆有法。”颜师古注:“舍匿,谓容止而藏隐也。”《汉书·王子侯表》载“元鼎五年(公元前112年),侯圣嗣,坐知人脱亡名数,以为保,杀人,免”。王子犯法同样治罪,可见对编户民任意流移、逃亡和私家隐匿逃亡者管理得严格。

户籍是国家赋税杂役的凭证和依据,也是官吏上计制度的重要内容,因此“统治者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,对户籍控制严格,在政权巩固、封建秩序稳定的正常情况下是能够做到的”^[20],但“西汉赋役,也有优免的规定,一般只免徭役,如规定各级官吏或有功人员,免终身徭役。而口赋一般都不免。地主家允许有私奴,虽无徭役,但要加倍征收徭役,说明他们都要编入户籍”^[23]。官籍尚如此,其他特殊户籍亦不必说。同时长安特殊的地位,避免了编户齐民的大量遗漏或藏匿,特殊户籍录入情况与政治利益息息相关,出现遗漏的可能也较小,“以整体论,汉代户口的掌握率,可以认为较之六朝隋唐时期为高”^[19],所以西汉有能力提供全面、可靠的户籍资料。虽西汉末战乱,但班固编纂《汉书》时,“仍可以利用残存的西汉官方户籍档案,数字来自第一手资料。而且,当时去西汉未远,出于追忆、传闻的材料也必不少,这就保证《汉志》的大致正确”^[20]。若

《汉书》只录入编户齐民,即便每里 100 户、一户 10 口也与“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”相差甚远,所以特殊户籍的人口也被包括在内了,但因私人奴婢既算主人家庭成员又算财产,京城卫士多是服兵役的编户齐民,是否将其纳入长安人口均不可知,但从长安人口构成看纳入情况。

3 长安的人口构成

3.1 宫内人口

“长安八条大街将城内分为 11 个区,未央宫(包括武库)、长乐宫(包括高庙)、桂宫、北宫、明光宫各占一区,共占长安城 5 个区,仅仅是这些大规模的宫殿建筑面积已超过整个长安城的 1/2。”^[12]因此,宫内人口是首要构成成份。据载,武帝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^[24];王莽败亡时仍有宫女数千人^[25];史料数十、数千的记载较多,大于一、二则为数,又《后汉书·桓帝纪》载桓帝博采宫女五六千人。《汉书·儒林列传》有三千记载,故数十、数千以四十、四千计;则平帝时宫女四千,宦者数量与之相当。后妃,自武元之后,世增淫费,至乃掖庭三千。^[26]成帝虽有减少,应不少于千人。还有女侍史、女史,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载阴太后崩“女侍史官三百人皆素参”。班婕妤作“陈女图以镜监兮,顾女史而问诗”^[26]。《汉书·韦贤传》载宣帝岁祠用祝宰乐人 12 147 人。因此皇帝、嫔妃、女史、宫女、宦官、乐人等娱乐人员,总约 21 000 人。

3.2 列侯、关内侯

《汉书·平帝纪》载元始元年(公元 1 年)封 36 列侯、34 个关内侯;后又封周公后公孙相如为褒鲁侯,孔子后孔均为褒成侯;元始二年(公元 2 年),封霍光从父昆弟曾孙阳、宣平侯张敖玄孙庆忌、周勃玄孙共、樊哙玄孙之子章皆为列侯。赐酈商等后玄孙酈明友等 113 人爵关内侯。史载还有邛成侯、王氏家凡 10 侯、敬武公主,除去明确记载归第的,剩下约 190 名。《汉书·元后传》载王氏五侯争为奢侈,后庭姬妾,各数十人,僮奴以千百数。《汉书·武五子传》载昌邑王被废后妻 16 人,子 22 人,其 11 男,11 女,奴婢 183 人。《汉书·史丹传》载内奢侈的关内侯史丹有妻妾数 10 人,子男女 20 人,僮奴以百数。故列侯、关内侯均按 10 位夫人、10 个子女计,加上列侯关内侯有 3 900 余口。因僮奴千百数为奢侈,百人为废王数。武帝曾“钱千万,奴婢三百人,公田百顷,甲第,以赐姊。”^[26]《汉书·张安世传》载张安世“家童七百人”。又有《汉书·食货志》载“哀帝时

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奏请:诸侯王奴婢二百人,列侯、公主百人,关内侯、吏民三十人”,因此每家僮婢按 300~500 人计,共约 6~9 万。有学者认为“当时长安宗室人口当在 3 万人左右……长安王公贵族所拥有的私奴婢相当大,估计当在 3 万人左右”^[27]。但贵族还有非宗室人员,且仅宗室人员也不止一人一个奴婢。又宗室成员多居封国,故此处未将宗室成员算在长安城内。

3.3 百官

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有明确数量的在京官员 2 189 名;郎中令下大夫数十人以 40 计;没有记数的有宗正中的诸公主家令、门尉,少府中诸仆射、署长、中黄门、将行、护军都尉等,三辅的办公人员等参照其他官员数量推测;总共至少 3 000。因《汉书·平帝纪》载元始二年(公元 2 年)“赐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钱五钱,四尸以上三千,二尸以上二千。”《汉书·晁错传》有五口之家“按照常理来说,进入封建社会之后,中国家庭人口数量规模一般为 5 口人左右。上可赡老,下可抚幼,这样的家庭人口数量规模,也是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”^[28]。因此,京城按每户 5 口计,官员也参照这个数字,官员与家属共有 15 000 人。以孔光、何武奏请吏民每家奴婢 30 计,至少有 9 万。

3.4 王官邸、郡官邸、蛮夷邸

史载长安有各国、各郡官邸用于各国、郡来京上计官员或其他人员住宿。《汉书·文帝纪》载“代王至邸而议之”。师古曰:“郡国朝宿之舍,在京师者率名邸。”还有共王留国邸旦夕侍上^[26]、傅太后与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国邸^[26]。今发现有“淮南邸印”封泥^[4]。郡邸内配备有监狱,《汉书·宣帝纪》载“宣帝襁褓时犹坐收系郡邸狱”。如淳曰:“谓诸郡邸置狱也。”师古曰:“据《汉旧仪》,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,属大鸿胪。”《汉书·王莽传》载元始五年(公元 5 年)正月祭明堂,诸侯王 28 人,列侯 120 人,宗室子 900 余人,故诸侯王以 28 计,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郡 50 个。而为其服务人员至少厨房 3 人、打扫卫生 2 人、出行 2 人、总管 1 人,监狱需 3 人,还有舞乐等,共至少 20 人,则邸官内共有 1 500 人左右。若官邸监狱内有关押犯人,则更多。

蛮夷邸,如《汉书·匈奴传》载呼韩邪单于朝天子就邸,留月余。又载宣帝“登长平,诏单于毋谒。其左右当户之群皆得列观,及蛮夷君长王侯数万,咸迎于渭桥下”,但西域“最凡国五十。自译长、城长、君、监、吏、大禄、百长、千长、都尉、且渠、当户、将、相至侯、王,皆佩汉印绶,凡三百七十六人”^[29]。即便

全出席,再加上西南夷、南粤等,也难达到数千万,此处有夸大之嫌。且“上遣稽留昆随单于去,到国,复遣稽留昆同母兄右大且方与妇入侍。还归,复遣且方同母兄左日逐王都与妇入侍……新都侯王莽秉政,令遣王昭君女须卜居次云入侍”^[29],前已有6次入侍。从侍子死归、留昆随去、还归等情况看,同时派两侍子的可能性小。有入侍记载的还有南粤、康居、乌孙、鄯善、大宛、楼兰、沙车、于阗等15个国家。因此侍子和妇人及服务人员共150左右。西域诸国若均有入侍,则不过500人。

3.5 军队

中央直辖的有卫尉统领戍守宫城安全的南军、中尉统领驻扎在长安城北部负责京城安全的北军;郎中令统领名义上隶属于南军的期门、羽林军。《汉书·韦贤传》载岁祠用卫士45 129人。推测卫士共5万左右,多为编户齐民服兵役者,所以并非均定居城内。而担任皇宫守卫的期门、羽林被载于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中,“与其他卫士相比,其身份地位较高,其中优秀者可转为他官。羽林孤儿父子相代,长期为兵,有世兵的性质”^[30]。鉴于此可能在京定居,记载期门多至千人,羽林不详,应不下千人,按一家3口计,共6 000余人。

3.6 博士及弟子

史载武帝始于京师设太学,置博士弟子员50人。昭帝增博士弟子员满100人,宣帝末增倍之,元帝更为设员1 000人,成帝末增弟子员3 000人。平帝征天下通知逸经、古记、天文、历算等教授者,遣诣京师,至者数千人。“元始四年(公元4年)有博士三十人,太学生一万零八百人,主事等职员七十三人”^[31]。太学在长安城外有校舍^[31],但博士和部分弟子住城内,如王吉琅邪人,少时带妻学问居长安^[24]。按博士、职员均住城内,则100人,家属两人计则不过200人。求学者多单身,故不计家属及僮婢,因经济原因只有少许住城内,按1/10计则千人。

3.7 商人和官营手工业奴婢

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载元狩二年(公元前121年)长安商贾纷纷与来降的匈奴浑邪王等人贸易,违反了贸易禁令而被处死者达500余人。但是,商人经营多样,并非全部与之贸易,所以当时商人不止500人。《汉书·刘屈氂传》载“太子引兵去,驱四市人,凡数万众,至长乐西阙下,逢丞相军,合战五日,死者数万人”。自古打仗兵数均有夸大,又市内人员复杂,故其中有籍商人最多千人。且武帝后对商人打压减小,所以到元始二年(公元2年)商人多不过3 000人。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载卓王孙“家

僮八百”,“分与文君僮百人、钱百万、嫁时衣被财物为富人”;“临邛富人程、郑亦数百人家僮”。又“茂陵富民袁广汉,家僮八九百人”^[10]。参考“富商大贾及地主阶级的户数就按总户数的十分之一计算”^[32],又“武帝时长安已有富商王君房、樊少翁和王孙大卿等”^[4],故平帝时,与卓王孙实力相当的富人增加至10人,每人家僮按400~800口计,共4 000~8 000口。与文君一样的富人应多于上述富者,按二倍即20人计,则家僮约2 000口。

长安城还有手工业区拥有官奴婢。《汉书·景帝纪》载当时长安附近使用官奴婢3万多人,养马30万匹,元帝时诸官奴婢达10万人^[24],总数有30万人左右^[32],但《汉书·地理志》当时有1 587个城市,故具体长安城内数量则不可知。推测比公侯或大富者家僮多2倍是可能的,约2 000人。

3.8 无籍人口

除定居闾里的有籍商人外,还有来京贸易的外国商人、国内流动商人和无市籍商人;还有前往京城谋职的辩士、文人墨客、游侠、刺客、技术工人或者乐舞等娱乐人员、巫祝、流民乞讨者,甚至还有犯罪分子。如《汉书·游侠传》载“长安炽盛,街间各有豪侠。(禹)章在城西柳市,号曰城西禹子夏”。《汉书·酷吏传·尹赏》载尹赏治理长安治安,“乃部户曹掾史,与乡吏、亭长、里正、父老、伍人,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,无市籍商贩作务,而鲜衣凶服被铠持刀兵者,悉籍记之,得数百人。”其中轻薄少年恶子可能在闾里有籍,其他两类则可能在长安城无籍,有数百人。从“太子引兵去,驱四市人,凡数万众”可见这些“多不入籍者”数量之大。

综上,列侯、关内侯等贵族有宅第,军队有驻军地点,百官及家属有官舍于官邸、郡官邸、蛮夷邸亦在官寺内^[9],较少居住于160里内,即“在城内,不仅有这种居民的里和宫殿,还有列侯等贵族的第室和许多官衙”^[15]。但是,有些高官居住区称里,现已知有戚里、尚冠里。除此外有158个里,每里40户,每户5口,则31 000余人。长安宫城内21 000人;列侯、关内侯等及家属3 900人,僮婢6~9万;百官及家属15 000人,僮婢9万;官邸2 000人;军队中居住长安城的有6 000人;博士及弟子1 300人;有市籍的商人奴婢6 000~10 000人;官奴婢2 000人;共238 200~272 200口。因列侯、关内侯、高官不一定全部住长安城内,而官奴婢相对于总数略少,私人奴婢可能有所隐匿,相互抵消,总体上与记载相差不大。所以有学者也认为“从总体形势看,武帝后上计制度基本上还可以比较正常地进行,这就是

为什么平帝二年的户口统计得到了史家基本认可的原因。虽然西汉晚期社会已不大安宁,人民流移者多,元始二年那个统计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,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反映当时人口规模的实际情况”^[23]。此外,长安有监狱几十所^[9],是否包括郡国官邸内监狱不可知,犯人数量《汉书·尹赏传》记载有数百,是否入籍不可知,再算上未入籍的成千上万的流动人口,则实际人口至多不过 30 万。

4 结 语

汉代户籍记录了当时所有在籍人员,为《汉书》编纂可靠的人口数量提供了可能,同时长安城内各构成成份数量亦有迹可推,在籍人口在 243 200 ~ 277 200,总体上与记载相近,因此《汉书》记载的人口数量基本是可靠的,但关于特殊户籍户数如何统计,尚不可知,有待进一步研究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班固. 汉书卷 28·地理志上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2: 1543.
- [2] 马正林. 中国城市历史地理[M]. 济南: 山东教育出版社, 1999: 160.
- [3] 武伯伦. 西安历史述略[M]. 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1979: 104.
- [4] 刘运勇. 西汉长安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2: 95; 46.
- [5] 赵冈.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[M]. 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06: 139-140.
- [6] 王子今. 西汉长安居民的生存空间[J]. 人文杂志, 2007(2): 150-158.
- [7] 王子今. 汉代长安乡里考[J]. 人文杂志, 1992(6): 83-86.
- [8] 周长山. 汉代城市研究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2001: 142-145; 8.
- [9] 张继海. 汉代城市[M].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 2006: 142; 256-257; 120-124; 126; 300.
- [10] 陈直. 三辅黄图校注[M]. 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1980: 32; 84.
- [11] 刘庆柱, 李毓芳. 汉长安城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03: 166-167.
- [12] 刘庆柱. 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——纪念汉长安城考古工作四十年[J]. 考古, 1996(10): 1-14.
- [13]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, 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. 河南内黄县三杨庄汉代庭院遗址[J]. 考古, 2004(7): 34-37.
- [14] 东北博物馆. 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[J]. 考古学报, 1957(1): 119-126.
- [15] 佐原康夫. 汉长安城再考[J]. 张宏彦, 译. 考古与文物, 2001(4): 85-93.
- [16] 高敏. 秦汉的户籍制度[J]. 求索, 1987(1): 72-81.
- [17] 王威海. 中国户籍制度——历史与政治的分析[M]. 上海: 上海文化出版社, 2006: 58-59.
- [18] 张荣强. 汉唐籍帐制度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0: 91-100.
- [19] 池田温. 中国古代籍帐研究[M]. 龚泽铨, 译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84: 66-72; 74.
- [20] 葛剑雄. 西汉人口地理[M]. 北京: 人民出版社, 1986: 116; 15; 13.
- [21]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. 张家山汉墓竹简[二四七号墓](释文修订本)[M]. 北京: 文物出版社, 2006: 51; 54.
- [22] 刘敏. 论“编户齐民”的形成及其内涵演化[J]. 天津社会科学, 2009(3): 135-142.
- [23] 路遇, 滕泽之. 中国人口通史[M]. 济南: 山东人民出版社, 2000: 94; 83; 84.
- [24] 班固. 汉书卷 72·王吉贡禹列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2: 3070; 3066; 3056; 3076.
- [25] 范晔. 后汉书卷 11. 刘玄·刘盆子列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95: 470.
- [26] 班固. 汉书卷 97·外戚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2: 3935; 3985; 3948; 4000; 4019.
- [27] 薛平栓. 陕西历史人口地理研究. [D]. 西安: 陕西师范大学, 2000: 18.
- [28] 袁祖亮. 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[M].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1994: 51.
- [29] 班固. 汉书卷 96·西域传[M]. 北京: 中华书局, 1962: 3928; 3797-3818.
- [30] 军事科学院. 中国军事通史(第五卷). 西汉军事史[M]. 北京: 军事科学出版社, 1998: 198.
- [31] 何清谷校注. 三辅黄图校注[M]. 西安: 三秦出版社, 2006: 357; 355-256.
- [32] 胡寄窗. 中国经济思想史(中册)[M]. 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63: 150.

(编辑 徐象平)